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专题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笔谈

逢锦聚 何德旭 魏后凯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构建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逢锦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力倡导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身体力行,立足中国实际,总结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为我国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南,也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指导思想和丰富滋养。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任何科学的经济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经验的结晶。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站在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前沿,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人民的关切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什么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如何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及世界向何处去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经济思想有极其丰富的科学内涵。包括: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坚持和完善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在内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把农村、农业、农民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统

* 逢锦聚,南开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筹安全和发展；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等。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集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于一体的理论体系，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蕴含着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财富，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学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反映时代进步，构建和发展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创立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面对新时代和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②

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是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源泉。聆听时代和实践的声音，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关切，坚持问题导向，讲好中国故事，揭示中国经济特殊运行规律和其中包含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来源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实践。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制度、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环境，特别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等，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一个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实践。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开放，从生产落后走向现代化强国，这样大跨度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

实践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炼出一系列创新性的观点和理论，形成新的经济学说。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而且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站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世界百年变局的历史高度，着力对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中提出的重大课题进行分析，对于已经取得的经验进行理论阐释和总结，力求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过去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必将提出一系列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紧跟时代和实践的新发展，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进一步形成系统学说。这是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着重点。

①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1页。

三、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三种理论资源， 广泛继承借鉴前人成果，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都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大的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①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中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增量。其次要用好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中的优秀经济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漫长的经济实践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许多优秀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在农耕文明中，我国的经济和经济思想更是领世界之先，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在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继续开发的富矿。再次要广泛吸收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经济学理论成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成果。这是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借鉴。对于上述第一方面的资源，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进行学理阐释，使之成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指导思想和最宝贵源泉。对于第二方面的资源，要努力加以挖掘，使之与时代相结合，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对于第三方面的资源，要认真学习、研究和分析，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在学习借鉴中，既要防止把某个国家的某种理论奉为圭臬，照抄照搬，又要防止一概排斥，自我封闭。

四、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着力创建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凝练、阐释系统经济学说，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逻辑结构

在长期探索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理论曾经进行了创新性的概括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做了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6 页。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①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这些理论进一步加以学理性阐释,揭示其内在联系,深刻挖掘其中蕴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使它们系统化、学理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经济学说,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科学的逻辑结构。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要全面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和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主题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思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是解决前进中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题。把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主线,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精髓,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有利于我们对为什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怎么样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怎样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所有重大经济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如果社会主义能把经济发展好了,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了,那么就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五位一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会充分体现出其优越性。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确定主线的基础上,要建立科学的逻辑结构。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着力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构建的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需要的理论体系。按照这样的思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首先要研究和阐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所处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发展和完善。其次要研究和阐释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理论。包括微观经济运行、企业改革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包括宏观经济运行、政府宏观调控。再次是经济发展。发展问题是解决前进中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理论涉及内容很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头戏。包括对以人民为中心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阐释,对发展目的和方式的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现代化道路的阐释,等等。最后是对开放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阐释。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结构可能不完善不成熟,但这是与我国正在发展中的尚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发展的理论、开放的理论。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紧跟实践和时代发展,以新的实践推动理论创新,以创新的理论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活力的保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

^①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11页。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科学指南^{*}

何德旭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征时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①秉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2022年6月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全面、准确、系统、深入地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以平实精练的语言、严谨科学的结构、生动朴实的文风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原创性贡献，展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传承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实践、浸润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是我们系统学习、准确理解、深入研究和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思辨，渊源深厚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出发，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

以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为例，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②这些重要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虚拟经济的理论。《资本论》主张，金融脱离生产过程并不能创造价值，生产是金融的基础，金融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实体经济的需要；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商业资本都是为产业资本服务的，借贷资本只有与产业资本相结合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 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③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痼疾，并认为应该从资本价值虚拟化的程度和资本的运动偏离生产过程的程度来考察。近年来，面对一度较为明显的“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④现象，基于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深刻洞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⑤不能就金融谈金融，更不能搞脱实向虚的过度衍生交易，要始终如一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摆正金融工作位置，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金融资产脱实向虚势头很快得到

* 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8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页。

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扭转，乱加杠杆、以钱炒钱活动得到有效遏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明显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要论断，直指西方资本主义的积弊。当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和金融霸权化的新转型时期，发展为“由金融股市的游戏规则占据绝对霸权、完全去人性化的无穷逐利体系”，“是一个越来越高度杠杆化、虚拟化的金融资本（股票）市场，是一个对扩增股值无限追求的超巨型体系”。^① 股东至上（shareholder supremacy）的普遍管理规则，意味着由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的股市来左右产业公司的行为和决策，后者作为历次金融危机之肇因已成为各界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就明确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波谲云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论断可谓振聋发聩、识卓见远。

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与金融共生共荣，呼应了亚当·斯密对于一国工商业过度金融化的警示：“当他们这样或者如以前一样‘依赖纸币做成的代达罗斯翅膀’（Daedalian wings of paper money）的时候，是不能做到完全的安全无忧的。”^③ 1890年10月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当金融贸易发展到证券贸易后，金融就不仅受生产所支配，金融市场也会产生自己的危机，工业危机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作用。^④ “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播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⑤ 资金脱实向虚、实体经济金融化均不利于金融安全。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⑥

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论断的另一方面，是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部署。一是完善金融体系制度建设，“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⑦ 适应创新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⑧ 逐步由目前的间接融资为主转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二是完善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特别是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⑨ 为有效减少金融摩擦，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奠定基础。三是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制度，“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⑩ 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以良性竞争促进金融产品体系优化及金融服务质量提升。四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⑪ 促进金融机构良性竞争，不断增强金融供给对金融需求的响应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所作的基于金融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生动凝练和高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丰富与发展，展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厚理论渊源、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特色。

①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1页。

②《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③转引自海因茨·库尔茨：《经济思想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7—60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4页。

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

⑦⑧⑨⑩⑪《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中国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追求真理的光辉智慧结晶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①实践生成于特定的历史、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情境与视域，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回顾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经济并没有遵循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一种既有的经济理论，或是按照某一种既有的经济实践模式来设计改革路径，而是基于中国自身改革实践要求，突破诸如“华盛顿共识”“亨廷顿悖论”等迷雾，不断建构、优化、夯实能够切实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习近平经济思想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为依托，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拘泥于往往由源自西方的形式演绎所主导的理论框架，“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②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经济建设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能够更好地总结中国经济运行特征与运行逻辑，更好地阐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内在动力，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与诸如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交织重叠。即便仅就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展开讨论，技术进步这一重要变量也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因而，要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仅从纯粹的经济学视角出发，无异于管中窥豹。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观察，习近平经济思想从更为完整、更为宏阔的社会系统的视角观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在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两大方面展现了其体系严整、谋划全局的鲜明特征。

在理论体系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秉持交叉融合发展理念，按照研究对象的发展逻辑和研究问题的内在联系进行理论建构，基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快速结构转型、反贫困、长期稳定等经济现实，突破了纯粹经济学的藩篱，开辟了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领域。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方位，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一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路径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鲜明主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基础，融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于一体的战略举措，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这一第一动力，大力发展战略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这一主要着力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这一重要法宝，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要保障，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这一方法论，全方位、立体式地构筑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以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为出发点，以追求学术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为旨归，融合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内建构经济学学术思想体系，特别是根据“两个大局”提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系列思想和理论，全面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时期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体系，全面创新和发展了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核心思想，建构了融合生动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系统性、学理性的理论体系架构。

在思想内涵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博大精深，超越传统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凸显政治经济学的本真价值理性及通向“美好生活”这一终极目的，将经济适用性、道德可取性和政治合理性贯通协调起来。

在经济适用性上，明确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新发展阶段要以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原则，以构建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2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路径选择,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网络和信息、生态环境、疫情防控等方面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根本上回答了新时代、新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完整地勾勒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路线图。

在道德可取性上,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诺奖演说第VI节“良好经济:创新与包容”中提道:“一个道德上可接受的经济必须有足够的动力使工作广泛地吸引劳动者并有足够的回报;而且要有足够的正义,如果这种动力不足以产生这样的效果,那么,至少要确保上述过程惠及最广泛的人群。”^①这一“超越宏观经济理论家通常预期的严肃哲学探究”^②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③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目标,正是立足中国实践贯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伟大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并将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④与时俱进地夯实了制度的道德可取性。

道德可取性的另一个鲜明例证体现在“环境”这样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习近平经济思想兼蓄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强调要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⑤“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⑥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要解决好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科技支撑不足问题,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等科技攻关,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⑦近年来陆续设立的各类碳金融中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正是以经济手段为主,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形成对接市场,但又加入政策性因素的超越一般市场运行规律的投融资机制。

在政治合理性上,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因为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⑧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表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① E. S. Phelps, (2007), “Macroeconomics for a modern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3): 543—561.

② R. W. Dimand (2008), “Edmund Phelps and modern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 23—39.

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24页。

④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4页。

⑥《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

⑦习近平:《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求是》2022年第11期。

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重要基石，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过多次重大风险考验，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经济金融安全，社会政治稳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发达经济体大肆推行财政金融刺激政策，引发了全球高通胀。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坚持“以我为主”，强调稳中求进，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在精准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防止“大水漫灌”固化结构扭曲，不断强化经济持续增长动能，为促进国民经济稳健运行和良性循环赢得了先机主动和政策空间。正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这一“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①才能够得到充分落实。在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②坚持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有利于处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辩证关系，在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同时，有效应对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的市场制度供给不足和局部过度市场化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更加健全的公平竞争制度、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确保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行稳致远。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浸润于中华文化，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根本价值取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③《尚书·尧典》有云：“克俊明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习近平经济思想浸润传统文化，极大地彰显了中华智慧文明。

第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④为最广大人民求发展、谋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⑤“我们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基本立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⑥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⑦在民生方面，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⑧在金融领域，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⑨这不仅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又突出了其传承中华文明治国理念精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鲜明特征。

第二，习近平经济思想主张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与其说经济学是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不如说经济学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③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213页。

^④《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⑥⑦⑧}《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版，第24、25、25页。

^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是关于怎样化解利益冲突的科学”，^①面对不断加剧的经济全球化逆流，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历程一再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②强调要“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③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大义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急刹车’或‘急转弯’，将产生严重负面外溢效应，给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首当其冲。”^④面对美联储较快收紧货币政策以及全球进入货币紧缩周期，我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稳字当头”，既展现了我国经济韧性强、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自信，更体现了以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维系经济平稳运行，避免全球同涨同跌，规避系统性风险，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更大贡献的责任担当。

第三，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致力于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持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⑤在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多边机制平台为重点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诸如《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创新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和平台建设的同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甲乙双方不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下，双方的平等互利交易会对双方都有利，并且能够推进双方经济的分工，由此可显著提高生产率，以实实在在惠及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平等互利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拒绝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征服与占领，以及剥削、支配和霸权，而将主要依赖自愿、平等、互利来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⑥因而迥异于霸权资本所追逐的单一营利最大化、股值最大化，以及占据/拥有供资本逐利的自然资源的目标。这一全新的思路，以一种更为自信的姿态、更为宽广的、综合中西的视野，形成一种“具有超越中西对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与计划经济和公有化对立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开启了超越性、远瞻性的愿景”，^⑦更可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消退后，有效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化经济结构、国家与区域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脱钩”困境指明了方向。

传承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实践、浸润中华文化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与时代同步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经济课题，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气磅礴，清晰地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屋建瓴的认识和既广且深的观察，清晰地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理论创造力。习近平经济思想时代背景广阔、理想信念坚定、人民立场鲜明、理论渊源深厚、实践基础坚实、全球视野宏大，必将以参天大树的姿态进入世界学术之林，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宝库，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泽被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A. A. Alchian & H. Demsetz(1973), “The property right paradig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1): 16—27.

^②习近平：《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 页。

^{③④⑤}习近平：《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人民日报》2022 年 1 月 18 日。

^⑥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1 年 4 月 21 日。

^⑦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36 页。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魏后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率先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部署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三大战略之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近年来在各种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有力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转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了鼓励有条件的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转变、国家投资布局重点的东移和率先实行沿海开放政策，是支撑这一战略的主要政策措施。^① 总体上看，这一战略较好发挥了东部地区的优势，提高了资源空间配置的效率，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中国迅速扩大经济总量规模、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提供了强力支撑。然而，单一鼓励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也带来了区域发展差距尤其是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扩大。从1980年到1989年，东部与西部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差距由44.7%扩大到50.0%，东部与中部间相对差距则由38.9%扩大到43.7%。^②

面对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上重要日程，并确立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1991年3月，李鹏同志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首次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促进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九条重要方针之一。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④“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⑤这一时期，虽然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但区域发展差距尤其是东西部发展差距仍呈现迅速扩大的趋势。到1999年，东部与西部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差距急剧扩大到60.2%，东部与中部间相对差距则扩大到52.6%。

自1999年以来，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家先后制定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

* 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① 参见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8页。

^②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相对差距系数=(东部指标值—中西部指标值)/东部指标值×100%。

^③ 李鹏：《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1991年3月25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④⑤}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9页。

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启动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样,在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全覆盖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优先位置,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则强调要“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随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东西差距实现了由扩大到缩小的根本转变。到2016年,东部与西部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差距下降到44.3%,东部与中部间相对差距则下降到38.7%,分别比2003年下降了15.1个和16.7个百分点。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将之并列为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举措,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发展不平衡集中体现为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集中体现为乡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不充分。在新形势下,全面贯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必须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则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本举措。可以说,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转折。

这种转折标志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包括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内的更高层次的国家重大战略,是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种战略集成和综合。^①早在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就将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作为“第五篇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核心内容,并将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发展纳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之中。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将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两大战略举措,同时将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列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又将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与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并列,并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拓展蓝色经济空间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新时期,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统筹各项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构建多层次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具有十分重要且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全面把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要义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率先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确立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阐明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任务、机制和路径,为新时期全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区域协调发展是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提出来的,它是一个相对平衡的动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是搞地区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

^①目前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狭义和广义理解。从狭义看,它是指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因而常与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并列使用;从广义看,则包括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在内。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本文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广义理解。

^②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

资源配置均衡，不断缩小各地区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明确指出：“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仅看作是缩小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而应该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①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归纳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②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将“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纳入区域协调发展中，强调“既要促进地区间经济和人口均衡，缩小地区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也要促进地区间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缩小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间的差距”，^③丰富和拓展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

2. 确立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包括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在内的多层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④并将老少边穷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和陆海统筹整合其中，形成了陆海国土全覆盖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2018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⑤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还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其目的是开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⑥他还将主体功能区战略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中，强调要“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形成定位清晰、各具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⑦

3. 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和任务。中国是一个城乡区域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具有自己的国情特征。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必须走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中，特别强调各地要从实际出发，走新路、开新局，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在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⑧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他指出：“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发展格局。”^⑨2019年8月26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他又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⑩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还就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各省区市发展的方向提出明确具体的意见。例如，他提出了“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长江经济带

^{①③⑨}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9—50、71—72、86页。

^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1日。

^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2日。

^{⑥⑦⑩}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

^⑧《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等新要求;强调西部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京津冀要“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长江经济带要“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黄河流域要“坚定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阐明了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和路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关键是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①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又强调,要“按照政策精准化、措施精细化、协调机制化的要求,完整准确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② 按照上述要求,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着重从区域战略统筹机制、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区域合作机制、区域互助机制、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区域政策调控机制和区域发展保障机制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重点任务。2019年8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并从全国统一商品和要素市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土地管理制度、能源消费双控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六个方面阐明了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及其实施路径。^③

三、深入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近年来,中国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区域重大战略为引领,扎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明确了各区域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激发了区域经济活力,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合理分工,区域发展差距尤其是东西差距进一步缩小。到2020年,东部与西部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差距缩小到40.3%,东部与中部间相对差距缩小到34.7%,均比2016年下降4.0个百分点。特别是在国家政策和其他地区的支持下,民族八省区自2007年以来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增速每年均高于其他地区,2007—2020年年均实际增速达到9.7%,比其他地区增速高出0.8个百分点;民族八省区地区生产总值占31省市区总额的比重由2006年的8.8%提高到2020年的10.3%。然而,还应该看到,尽管东西差距在逐步缩小,但近年来南北差距却在不断扩大。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区域经济增长不景气由东北地区向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扩散,南北差距问题已经由过去的增长速度差距转变为发展水平差距。1993年,南方和北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水平(以各地区平均为100)大体相当,之后南方相对水平开始超过北方,^④二者差距不断扩大。到2020年,南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水平已提升到109.0%,而北方该数值下降到86.8%;其中,东北地区下降到72.3%,已经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深入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1. 要把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作为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对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和领域提出的新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所指出的,高质量发展“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⑤ 而区域协调发展旨在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它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7期。

^③参见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

^④北方是指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份;南方是指除北方之外的其他16个省份。

^⑤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33页。

应有之义。将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区域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走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之路，是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方向。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我们所追求的区域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2. 要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各项国家战略的合力作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有机耦合形成的战略体系。在这一战略体系中，以“四大板块”为地域单元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是全覆盖的，它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和核心，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全国区域发展的统筹安排和总体部署；区域重大战略是以关系现代化全局的重要城市群和流域为地域单元，以推进一体化、构建共同体为核心，聚焦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它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体系；主体功能区战略以各类主体功能区为地域单元，重在按照其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导向，构建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这三大战略有机结合，将产生叠加效应、协同效应和融合效应，全面激发区域发展内生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3. 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一般地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空间配置的效率目标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然而，单纯的市场力量通常会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初中期阶段。为弥补市场缺陷，政府实施的区域政策将更多考虑公平目标，对那些急需支持或援助的区域实行雪中送炭。因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经济的效率实现机制不断把蛋糕做大；同时又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区域政策工具，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使各地区尽快走上高质量协调发展之路。需要指出的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既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的责任。这样就需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职责分工。就中央政府而言，重点是促进国家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并对老少边穷、重点生态功能区、粮食主产区等特殊类型区域给予支持。各省级政府同样肩负着促进省内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任，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区域协调发展，如江苏省苏南与苏北地区、广东省珠三角地区与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协调发展，主要是省级政府的责任。对于地级市而言，促进中心城区与其他县域的协调发展，也是各地级市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4. 要区分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政策，建立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区域发展战略是对区域发展的全局性长远谋划，是一种宏伟的蓝图，而区域政策是实现区域发展战略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初期阶段，其支持政策曾采取普惠性的做法，由此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后来开始逐步向分类施策的方向转变。从中国的实践经验看，要使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真正落地见效，一方面要以类型区为地域单元，使政策更加精细化、精准化，不断增强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当前，重点是按照经济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和特殊类型区，进一步完善差别化的区域政策。^① 这种差别化的区域政策，较好体现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有利于提高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体系，建立区域协调发展长效机制，包括市场机制、补偿机制、援助和帮扶机制、合作机制、参与机制、共享机制等。中国实行的对口支援政策，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口帮扶机制，它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胡家勇）

（校对：刘洪愧）

^① 参见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3—36 页。